

云南省楚雄州地方志丛书

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志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业局编

1990年9月

主 修：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业局

主 编： 周绍庠

编 辑：周绍庠 萧明伦

助理编辑：陈 青

审 稿：赵秉仁 赵 琨 杨春茂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局办公大楼



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站化验室



楚雄彝族自治州饲草饲料工作站进行饲料质量检



楚雄彝族自治州种鸡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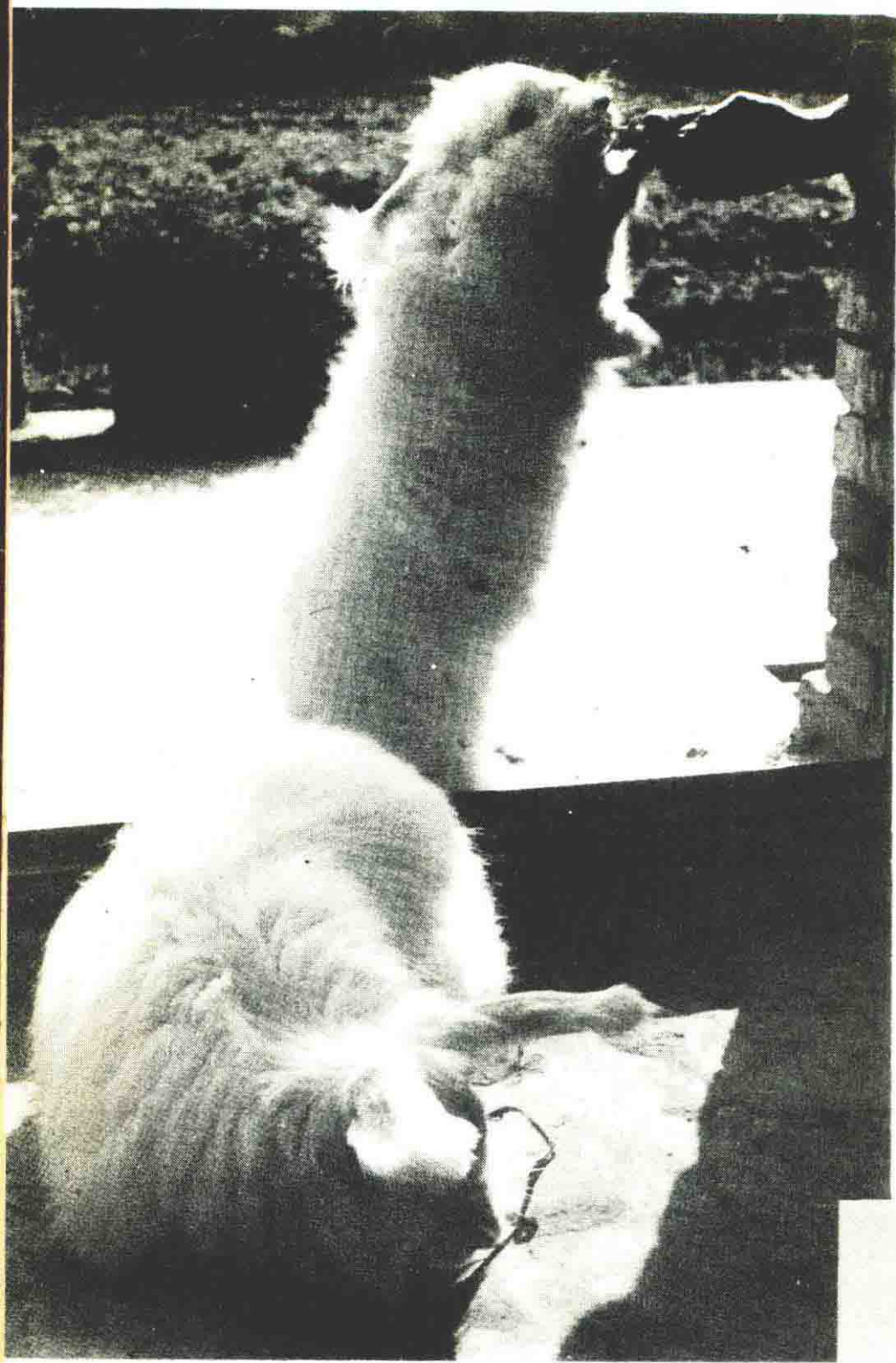
禄丰县舍资乡九盘岭（苗族）牛羊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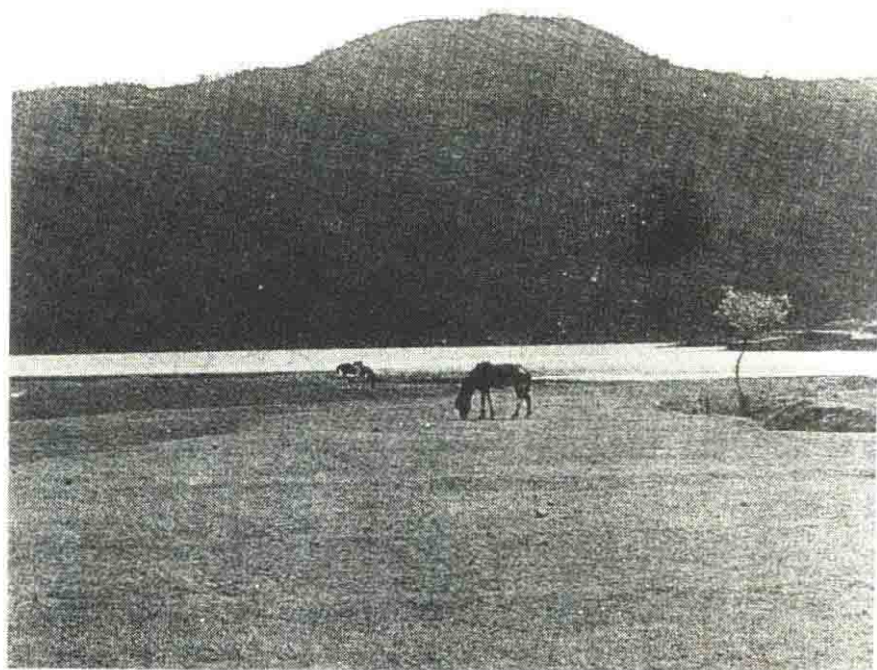
楚雄市哨湾村改良后的山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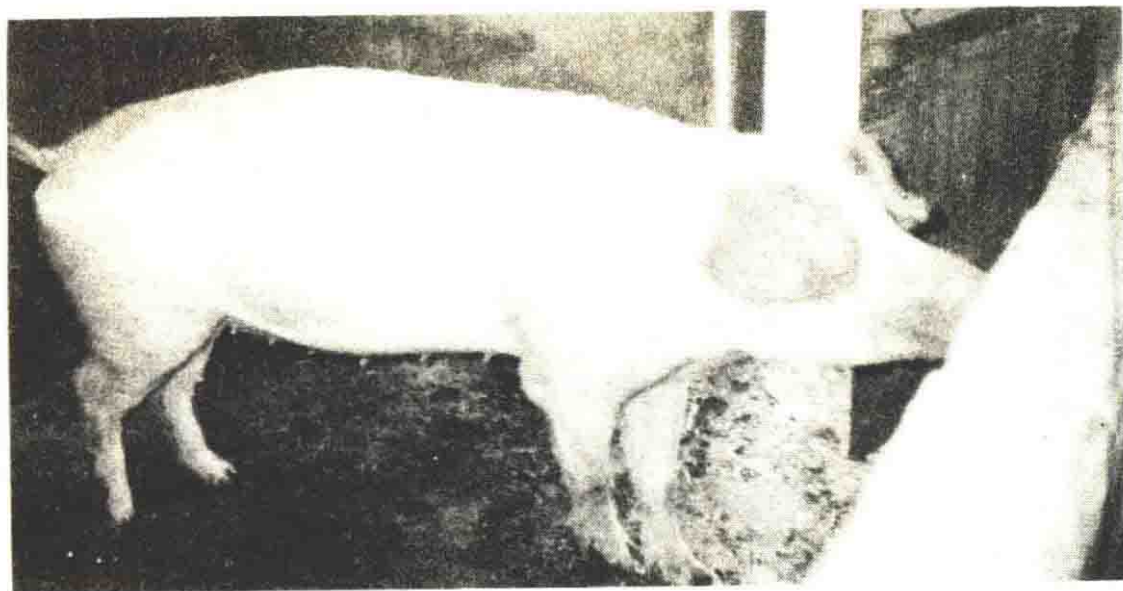
永仁县农村集市大牲畜市场



南华县引进联邦德国良种毛兔
(转载自《彝州四十年》)



马 (转载自《彝州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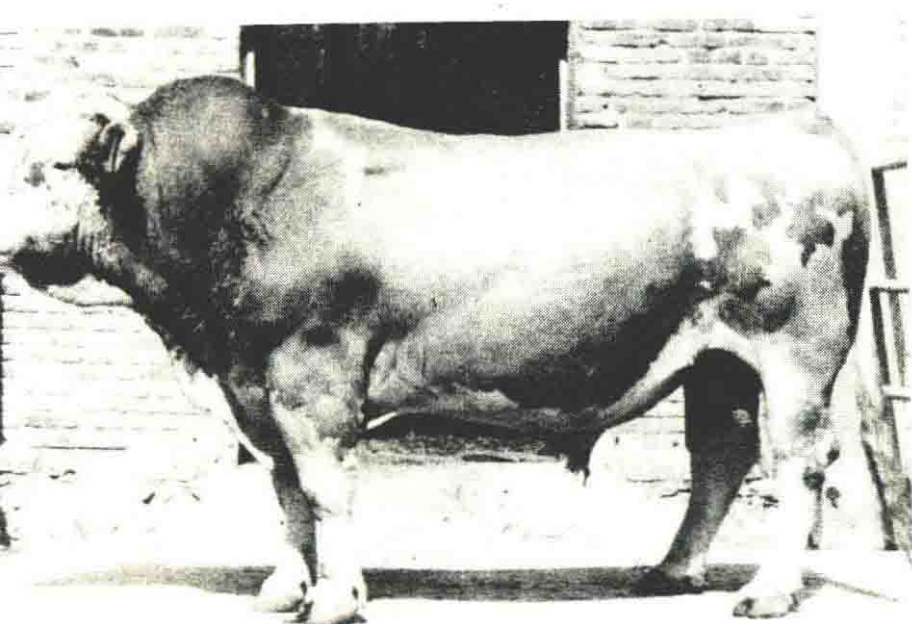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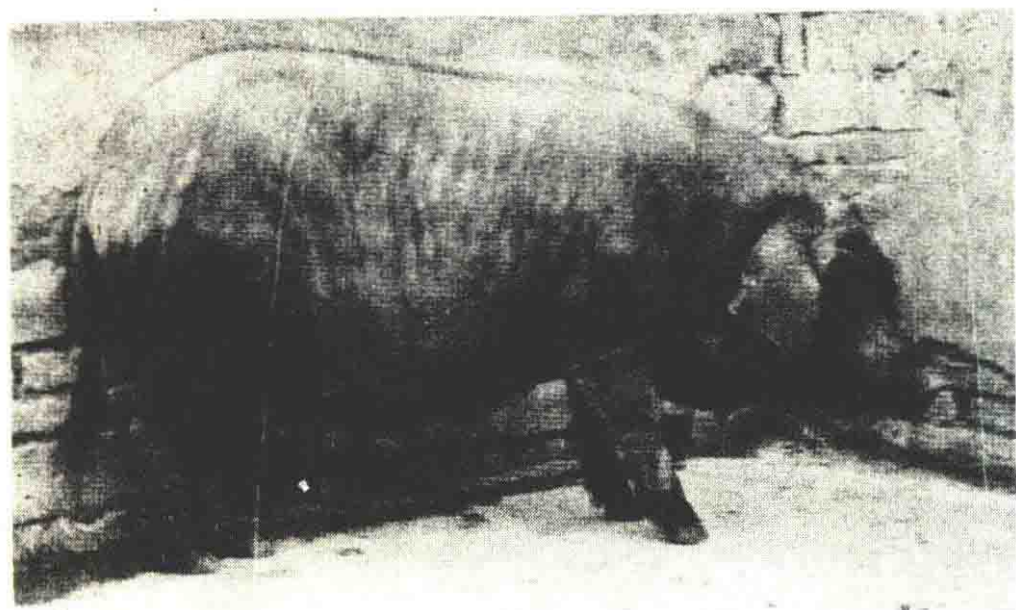


1、瘦肉型种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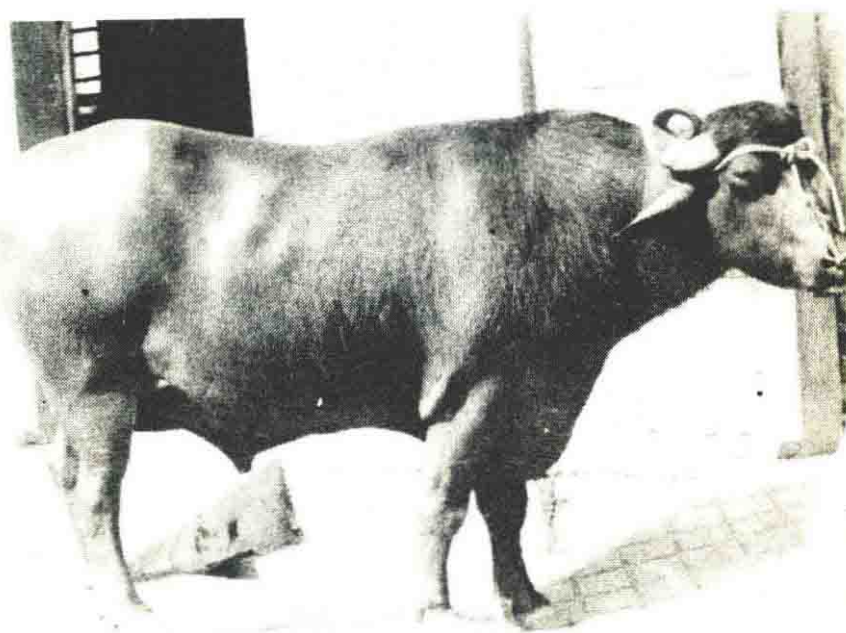
2、撒坝种公猪



3、撒坝种母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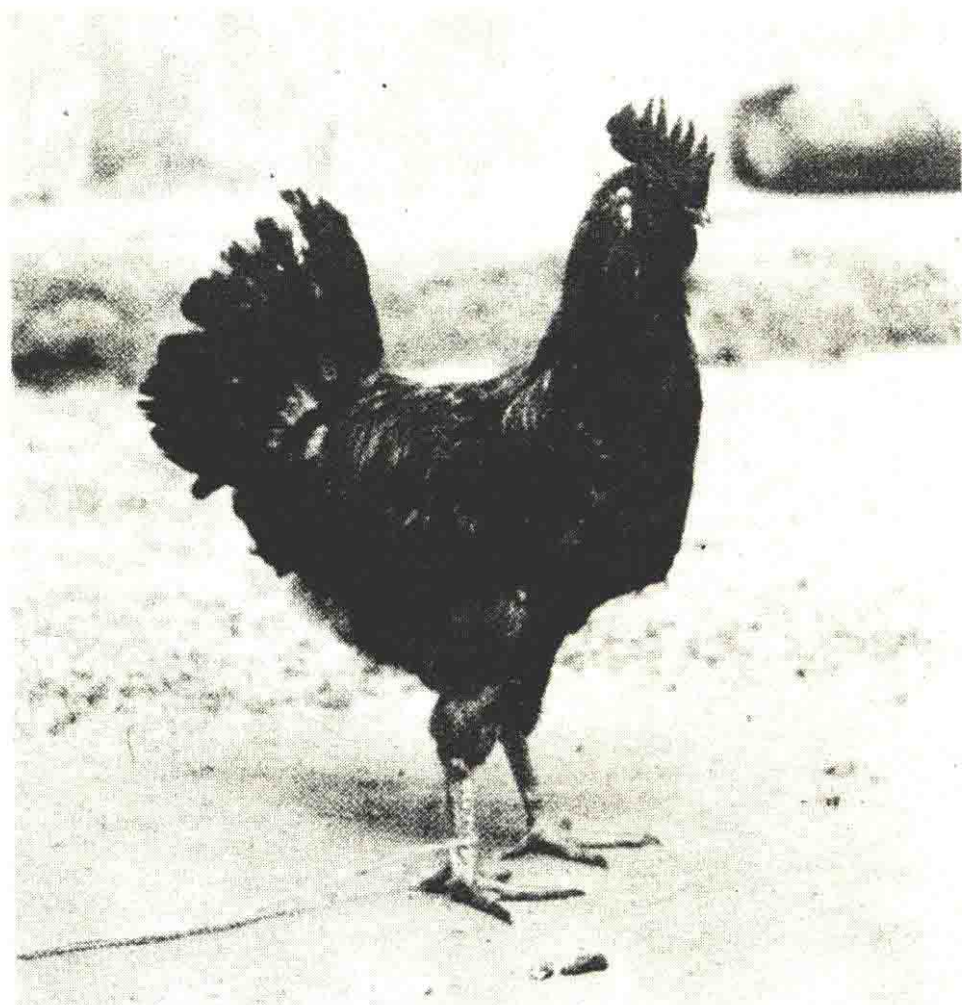
1 安格斯黄牛种公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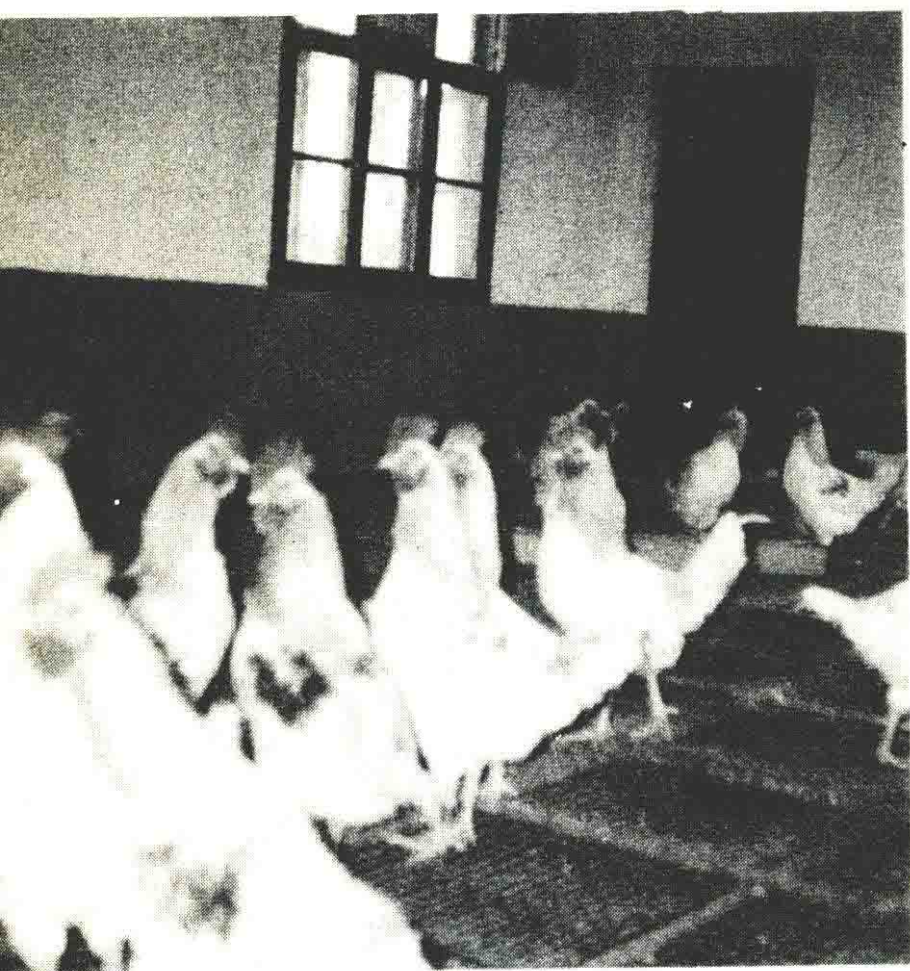
2、摩拉水牛冷冻精液改良本地水牛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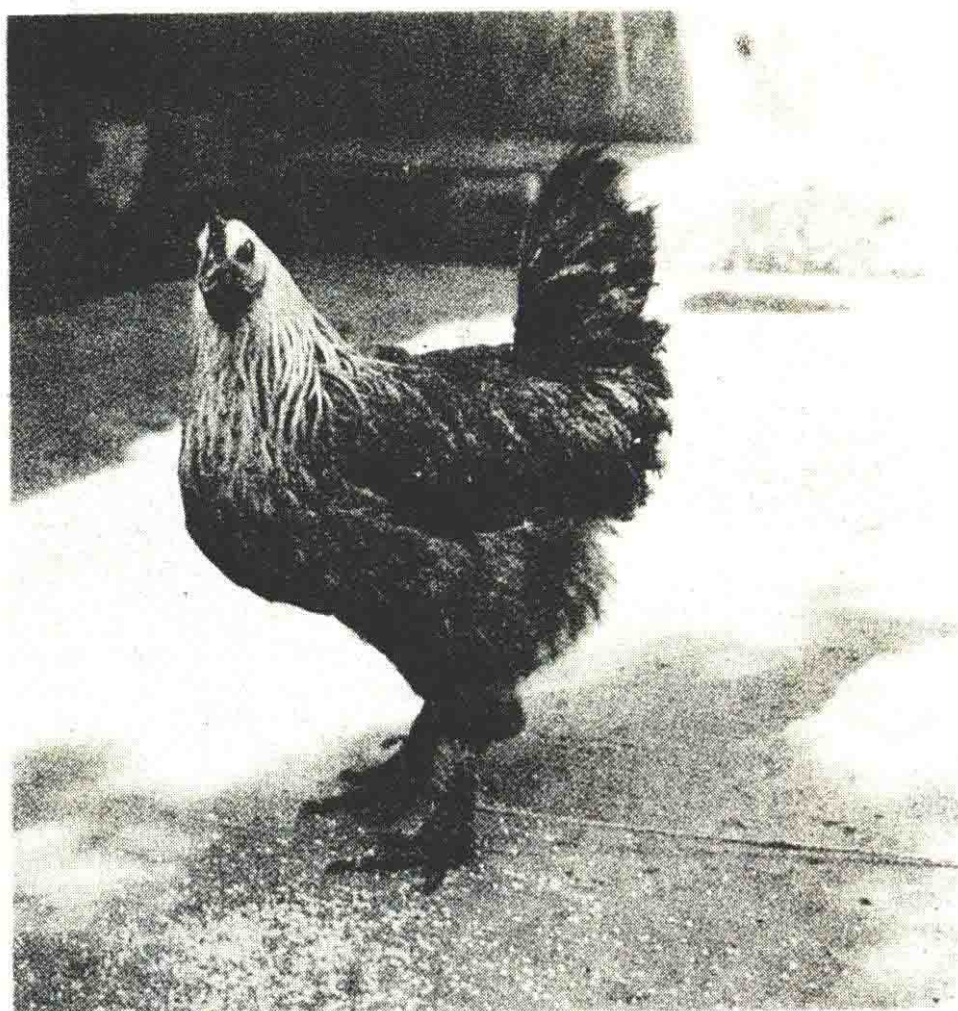
绵羊改良群



1、武定种公鸡



3、外引良种鸡



2、武定种母鸡

序 言

云南省审计局局长 张映海
前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由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业局主修，离休干部、前州畜牧局长周绍庠同志主编的《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志》，经过参编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已大功告成，定稿出版。我表示衷心祝贺。

这部畜牧志，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它记述了楚雄州近80年来畜牧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四十年中各个时期畜牧业的曲折发展过程，展示了楚雄州发展畜牧业的丰富资源，阐述了畜牧业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畜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很好的、内容翔实的畜牧业历史书。以史为鉴，既知过去，又资未来，值得认真阅读。

我国古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之名言。毛泽东主席亦有“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之论述。均说明了农业畜牧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楚雄彝州山、林、水、草资源丰富，宜农宜牧，且几十年来又为畜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继续努力，振兴牧业，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其发展前景，当无量矣。

草此为序，愿共勉之。

1990年4月写于昆明

序 言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业局局长 陈达有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志》和读者见面了。我作为本届新任农牧局长，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热烈祝贺。

“两志”四经春秋，几易其稿，辛勤劳作，终已付印成书，是彝州农牧业志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彝州各族人民几十年来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实践的结晶。“两志”的出版，是各级农业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成果。

党中央把发展农业生产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要求全党重视，大办农业。“两志”对于有志于发展我州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有识之士，不失为纵观历史，研究州情，总结经验，探索发展之道的有用材料。我十分坚信，在党中央英明决策的指引下，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州各族人民的奋力拼搏，我州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一定能走出徘徊，稳产高产，增产增收，为彝州的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0年6月7日

前 言

“两志”经过四度寒暑，已经编纂完毕。1985年秋，我局受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委托，承担编纂《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志》的任务。我局聘请离休老干部、原楚雄州畜牧局长周绍庠主编。1986年9月30日和12月30日，先后按期完成“两志”征求意见稿的初纂任务，并向楚雄州志办公室、历任主管农业的中共楚雄州（地）委、楚雄州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领导，历任楚雄州农业局（科）长、本局所属各单位，及几位农业科学技术人员递交了征求意见稿，征询意见。经过一年半的酝酿审议，按照楚雄州志办公室的要求，于1988年8月着手修改。在逐个收集修改意见、召开“两志”征求意见稿评审会议和补充校正资料之后，于1989年末先后完成“两志”的修改工作。曾任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局局长、现任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李春和，对“两志”的编纂工作给予直接领导，并审阅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志》，撰写了序言。曾任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农林科科长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副州长、现任云南省审计局局长张映海，对“两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畜牧志》撰写了序言。还有，历任中共楚雄（地）州委书记王文玉、余活力，副书记魏绪密，均对“两志”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历任领导人的指导和支持，使“两志”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两志”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指导思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求实存真，进行编纂。“两志”对中华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农业、畜牧业，依据史料，不褒不贬地作了记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业、畜牧业实行改革，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使农业、畜牧业获得大幅度的发展，均以主要篇幅，详细客观地作了记载。同时，对在此过程中，出现过的“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失误，也以适当篇幅，作了必要的叙述。

“两志”把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作为记载重点。农业志在第一、四、五、六章中，约以27万字记述了农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占总篇幅的60%左右。畜牧志在第一、二、五、六、七章中，约以15万字记述了畜牧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约占总篇幅的60%。且在其它章节中，以生产力是否发展，作为衡量变革生产关系，实施各项政策，推行各项农业技术的尺度。

“两志”的体例、体裁、结构和章法，由于我们对方志学理论，素昧平生，尤无实践。在编纂中，力求遵循史家法度，谋篇布局。纪、传、述、志、图、表、录俱备，以

概述为纲，大事纪为经，农业与畜牧专业为主体，附录殿后。图和表插于有关章节，文表相随，图文相伴。按照横排纵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结构严谨，领属得当，要素齐全。编写章法，采叙述体，叙而不论，述而不作。对资料取舍，力求详略得体，古今得体。

“两志”资料，得到各单位和各方人士的支持。楚雄州档案馆、统计局、气象处、林业局、物价局、水电局、商业局、粮食局、农业区划办公室、农业科学研究所、植保植检工作站、土壤肥料工作站、种子公司、茶桑站、良种繁殖场、畜牧兽医站、饲草饲料站、种猪种鸡场、经营管理站、园艺科学研究所、10县（市）农牧业局或畜牧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均提供了大量资料。还有高级农艺师邓有成、刘自西、耿尚吾、李盛富、李源、吴干洲、刘琰，高级畜牧师胡馨芳、刘伯伦，高级水利工程师余开明，气象工程师唐泽元等大批农业、畜牧业科学技术人员、行政工作人员和离休退休干部，均为“两志”提供、撰写或校正了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楚雄州志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中共楚雄州林业局委员会书记邵长京为“两志”的编纂进行了大量指导工作。

“两志”蒙《楚雄州志》副总编杨春茂作了审查修改。

对于上述单位和同仁，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思想水平和史志理论水平低，“两志”难免有不足之处或讹误，望读者予以指正。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牧业局

1990年4月15日

凡 例

一、记述断限，上限起自公元1911年、下限到1987年为止。为了记述事物的发端，对元、明、清三代与农牧业有关的情况，采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作了一些必要记述。

二、体例、体裁、结构和章法，采取横排纵写，以横为主，纵横交错的编纂方法。章与章、节与节、目与目之间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无相互联系、继承和补充的关系。以叙事为主，述而不作。语法、句法采语体文体。为尊重原著，引述古体著作不作译白。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志、表、图和附录6个部份组成。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以农业记述为主体，文表相随。附录刊于卷末。

四、本志设章、节、目三个档次，都用汉字书写。章、节、目标题，居中书写。节下目下各档次均另起一行，空两格书写。引述他人著作文籍仍用原书档次。

五、记数与记量，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颁布的，并于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引述他人著作、文籍中的记数、记量，仍循原著。计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书写。

小数后取两位数，四舍五入。由于各种数据辗转换算，且采四舍五入法，有些数据与原数据出处略有差别。

有个别记量单位，例如土地面积，原资料按习惯面积以“工”为单位记算，多少“工”折合一亩各乡不一。因此，为避免折算混乱起见，仍沿用习惯计量单位。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均用汉字。例如一律，一书，三个、五项、五街，一面锦旗，三种疾病，“二五”计划，十之八九。

一位数，在一组表示科学计量时和具有统计意义时，均用阿拉伯字。

数字在表示次第时，例如第一、第二；在表示等级时，例如三等、四级；在表示并列顺序时，例如一是，二是；一为，二为，均用汉字。

出于上下文的照顾和同一语句的原因，需用阿拉伯字时都用阿拉伯字，需用汉字时则都用汉字。例如3个县15区的1,200个村子。

四位和四位数以上，用三位分节法，仍按习惯采用分节号。

六、数据以楚雄州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法定数据。未列入国家统计资料中的同一数据，有前者和后者不一致的，均舍其前者，取其后者。部门的数据与统计部门数据发生矛盾时，均用楚雄州统计部门数字，个别部门不愿放弃自己数据，则两数并列。有些数据在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准确的困难，只取其概述数，舍其具体数。

七、行文中，有些名词和词组很长，多次出现，有重复和晦涩之感。除力求使用全称外，同一名称在同一段落、或前后相邻几个段落等情况下，使用简称。并在这些名词和词组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以下简称×××”字样。

八、原属楚雄、武定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行政区划内先后划出的县份，记述到划出时为止。禄劝县于1983年末，划归昆明市管辖，本志所有1983年末以前的数字，均含禄劝。1983年末以前的数字互相比较时，亦均含禄劝。1983年12月31日以前和1984年1月1日以后的数字相互比较时，则减去1983年末以前的禄劝数字。

在建立畜牧业的所有制问题上，楚雄州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始终没有跳出“大、公、平”的圈子。“大”和“公”是精神支柱，平均主义是问题的实质。过去由于实行“公有公养、共管公放”，吃“大锅饭”，牲畜大量死亡，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在没改变“公有公养、共管公放”的条件下，实行了定人、定工、定膘、定肥和繁殖幼畜奖励的“四定一奖”责任制。但由于平均主义贯串在“四定一奖”之中，好的制度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饲养员得不到直接利益。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直接劳动者相分离，背离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楚雄州畜牧业上“一刀切”地实行的这种“公有公养”的形式，放大群，关大栏，强欺弱，大欺小，对放牧者搞平均主义，给生产力带来了损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抛弃了“公有公养”的经营方式，对大牲畜和山绵羊实行了“公有私养、幼畜分成，一半归社员，一半归集体”的联产责任制，使畜牧业有了内在经济活力。

1981年的下半年，随着农业“两包到户”的落实，百分之九十几的生产队，对大牲畜和山绵羊采取私有私养，实行“折价到畜，按人分配，牲畜归私，价款分年偿还”的办法。两百多万农民的行动，不可逆转，要求改革，实行私有私养的经营方式，对生产关系作了重大调整，畜牧业产值、产品、数量、质量都有提高。以1985年为例，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8.9%；生猪存栏量达121.07万头，户均3.08头，肥猪出栏57.85万头，商品量29.61万头，每头重84.2公斤；大牲畜74.93万头；羊120.63万只，均比改革前的1978年有较大增长。

私有私养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大牲畜和山绵羊不属于基本生产资料的范围。第二、大牲畜具有生产、生活资料的两重性，山绵羊则完全是生活资料。第三、大牲畜和山绵羊作为劳动对象，可变性很大。第四、经营者和生产者合而为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饲养积极性。第五、实行私有私养，符合牲畜需要精心饲养的特点，符合楚雄州草山草坡分散的实际。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一个核心问题，关系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主要问题，在于不顾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千篇一律地把“公有公养”，在生产队普遍实行。错误地认为不管生产力水平如何，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生产就越发展。实践证明，这种理论认识是“左”倾思想的产物。实行“私有私养为主”的形式，不能说是“倒退”，而是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践证明，楚雄州的畜牧业已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发展饲养业专业户、重点户，依靠四十几万户农民现有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源和投资能力，是发展楚雄州畜牧经济的新路子。也是改造自给性、半自给性的家庭副业为商品性的家庭饲养业的新路子。

禄丰县黑井公社瓦窑头生产队，42户，回族，人均土地0.6亩，单产200公斤，生活比较困难。1980年，养菜牛141头，户均3.3头，卖给国家75头，自食66头，增加收入2万余元，等于这个队的农副业总产值。

饲养重点户、专业户的出现，是开动机器，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结果，是落实“两包”到户责任制的必然趋势。投资少，周转快，商品率高，发展速度快。

近年，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农业经济从单一经济中解脱出来，乡镇企业崛起，农民就业机会增多，对劳动报酬的选择意识逐渐增强。由于物资费用上涨，畜牧业生产成本增加，虽然畜产品价格也作了调整，但并没有解决畜牧生产效益低的问题，农民不安于低工价的畜牧业收入和负效益生产。在经济较发展的地方，农民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农村家庭付业已开始从畜牧业转向运输业、建筑业、农副产品加工或商业性经济活动。农业经济结构改革中出现的这类新问题，有待于作出结构性、政策性的调整。

五

建设三个体系，形成生产能力。

三个体系，是指防疫治病体系，饲料加工体系和畜种改良体系。

防疫治病体系，是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保护商品生产发展，保护农民富裕起来的重要手段。它包括各级畜牧兽医组织的建立，技术队伍的组成，冷藏设备的提供，医疗手段的具备，交通车辆的保证，生物药品的生产，和市场检疫的开展，等等。这个体系建成了，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减少了牲畜的死亡量，为提供出栏率和商品率准备了条件。楚雄州危害生猪发展的三种主要疾病猪瘟、猪肺疫、猪丹毒，曾夺去了社员大量财富和社会无数产品。1952年以来，各类牲畜的较大死亡，曾出现过多。1964年，仅3个月，就死猪5万余头，曾造成当年6%的减产记录。十几年来，这个体系已初步建成，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基本控制了几种主要疾病的危害。近两三年来，由于开放集市贸易，虽然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济渠道，搞活了经济的大好局面，但也出现了疫病的多种传播渠道。因此，必须继续完善这个体系的建设。

饲养加工体系，包括家畜家禽饲养标准的制订，能量代谢的研究，饲料工业的建立，配合饲料的应用等等。配合饲料，是蛋白质的提供者，是根据营养元素平衡和互补学说，利用植物性、动物性和矿物性饲料的互补作用，配制而成的促进畜禽生长、生活、生产、生殖的营养物质。楚雄州推广配合饲料已有多年，生猪普遍获得较好的日增重。这充分说明建立配合饲料体系，是缩短育肥期，提高出栏率、商品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畜种改良体系，包括本品种的选育，外品种的引进，冻精改良技术的采用，种畜场的建立，等等。毛羊改良就是一例，当其靠本地粗毛羊本交，一只成年羊的产毛量不过1公斤左右。当其改良后，产毛量达3公斤，甚至4公斤，经济效益非常显著。当然，引进外种，只能逐步进行，需要走一段很长的道路。过去，楚雄州引进了大量国内外优良品种：约克猪、内江猪、巴克夏猪、杜洛克等猪种；卡巴金马、蒙古马、青海马、摩尔干马；秦川牛、高峰牛、摩拉牛、荷兰黑白花牛等水牛、黄牛；新疆羊、林肯羊、罗姆尼羊、高加索羊、美利奴等细毛、半细毛绵羊；灰兔、大青兔、安哥拉兔、西德兔等肉用、毛用兔；狮头鸡，北京鸭，白洛克鸡、来航鸡、北京白鸡、西塞斯鸡、新波罗鸡等。其中有些已安家落户，不少则因种种原因未获成效。不可操之过急，盲目外引。事实上，投资最小，经济效益最大，发展速度最实在者，莫过于本品种选育。楚雄州的畜牧业中，有许多优良的畜种，抗逆性强，适应性广，肉类、毛类的产量也高。从中选育优良种公猪、种公牛、种公羊和其它种公畜，形成一个本品种改良体系，就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牲畜个体小、增重慢、饲料报酬低等退化现象。

三个体系建成，最重要的是投资问题。许多畜牧业干部认为，应给畜牧业足够的投

资，集中力量，一个体系一个体系的建立，形成生产能力，就能确收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之效。这个投资必需是足够的，而不是半饥半饱的；必须是集中的，而不是零敲碎打的；必需是慷慨的，而不是吝啬的。对畜牧业资金投入不足，是楚雄州面临的一个制约。如1983年至1988年6年间国家支援畜牧业的资金，包括事业费、基本建设费、科技费，仅占畜牧业产值的2.06%。（见附表）

楚雄彝族自治州1983~1988年畜牧业投入与当年产值对照表

年 度	畜牧投入（万元）	畜牧业产值(万元)	投入占产值比例
1983	160.90	10,042.00	1.61%
1984	134.06	10,750.00	1.24%
1985	136.61	10,353.68	1.39%
1986	225.65	9,983.37	2.26%
1987	266.65	10,628.00	2.51%
1988	368.44	10,930.00	3.37%
合计	1,292.31	62,687.05	2.06%

畜牧业基础建设缺乏资金，难以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转变。逐年增加国家投资，参照畜牧业产值或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调增畜牧业资金投入比例，是实施畜牧业科技路线的重要保证。

六

发展山区畜牧业经济。

1981年，楚雄州152个公社和19,000余个生产队中，地处半山区的有21个公社，2,141个生产队。地处山区的有71个公社，7,725个生产队。还有14个公社，1,461个生产队则处于高寒山区。加起来，山区、半山区和高寒山区共是106个公社，11,327个生产队，占全部公社的70%、生产队的67%。整个地区252万人口中，有153万余人居住在山区。畜产品的提供，大部份来自山区。以1979年为例，收购菜羊78,700只，产肉量150余万公斤，大部份来自山区。收购菜牛14,600头，产肉量100余万公斤，也大部份来自山区。收购毛猪26.22万头，毛重1,670余万公斤，有50%左右也是来自山区。轻工原料6万余公斤羊毛的全部和10万余张羊皮、1万余张牛皮的大部，都有赖于山区作出贡献。再就发展山区农业而言，增产粮食和经济作物，畜牧业是最基本的肥源和动力资源。山区畜牧业经济，活跃在各个部门经济之中。国家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没有山区畜牧业经济的参加，经济结构是不可能合理的。

楚雄州山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人口中，据1982年人口普查记载，有彝族57.05万人，苗族4.11万人，傈僳族4.79万人，回族1.71万人，白族0.95万人，傣族1.90万人，分别占当年全州总人口的22.48%、1.62%、1.89%、0.67%、0.38%、0.75%。还有哈尼、布衣、壮、满、藏、蒙古、纳西等民族。畜牧业的兴衰，是少数民族经济利益的寄托所在。

保护草山草坡，保护山区植被，保护山区物种，关系山区人民的富裕程度极大。其

保护程度，从实质上反映了山区人民的富裕程度。山区人民要富裕起来，舍此莫为。据1979年统计，我州有33个山区公社，每年人均总收入仅51~80元，且有3个公社人均还处于50元以下。其重要原因，是草山草坡，被严重破坏，畜牧业经济处于严重萎缩状态。绵羊吃不饱，毛产量低，饥饿痕多。山羊吃不饱，体膘不肥，三级羊多。役畜吃不饱，异化作用大于同化作用，挣扎在饥饿线上。闲畜吃不饱，膘不肥，体不壮，毛色蓬松，所值无几。适龄母畜吃不饱，发情率、受胎率低，浪费资源。种公畜吃不饱，胡萝卜素供给不足，维生素A缺乏，精液品质不好，精虫活力不强。幼畜吃不饱，发育成长缓慢。老畜吃不饱，消瘦死亡，难成商品。由此可见，山区人民要富裕起来，取决于山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速度。

畜牧业适应性广，抗逆性强。依靠生态平衡，不但在粮食增产年份，能获得增产，就是在减产年份，也可能获得增产，或减产不大。地处亚热带气候的双柏县戈孟田生产队，1980年严重干旱，粮食减产三成八，而畜牧业则按产值计算增产二成八。原因何在？因粮食生产是一座“露天工厂”，遇冻遇旱，无法躲避。畜牧业生产则不然，它是一座“活动工厂”，本身具有抗拒一定自然灾害的本能，能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人们还为它修建了厩舍，可以日夜舍饲，躲雪避冻。尤其是在冰雪封山的数九寒天，和大旱席卷的三伏天气，可以利用立体气候的特点，采取游牧方式，从高海拔的高寒地带，转移到中海拔、低海拔的地带避寒。也可以因旱缺水，栖息在有水资源的地方解决。牲畜依靠它自己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可摆脱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以粮为纲”的“左”的影响下，只注重抓粮食生产，忽视了林、牧、渔、副的发展。只看到6%的耕地这个资源，看不到林业、牧业这些资源。为了单纯地抓粮食，草山草坡遭到严重破坏。草本、藤本、攀缘、寄生、附生、苔藓、地衣被大量破坏。饲草缺乏，使牲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生长、生殖、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以楚雄县为例，有牛马羊等草食动物13.63万个黄牛单位，而饲草产量的理论载畜量，却只有11.8万个黄牛单位，超载13.9%，计1.83万个黄牛单位。

林业体制改革中，进行了“稳定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三定”改革，填发山林权证55,982份，划定了自留山1,279.99万亩，落实了责任山1,273.8万亩，分别占林业用地总面积的33.29%和33.12%，使疏林草场、浇丛草丛和草本草场获得有效保护。

加强草山草坡建设，培养牧草资源，禁止蚕食草山，实为发展山区畜牧业经济的重要议程。